

“五四”式苦闷：许钦文文学理论的个性化书写

刘恋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文法系,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五四”作家许钦文因其自身经历所带来的生命感受,更因其与鲁迅先生文学及其理论的血脉承接,以授课讲义《文学概论》,表达了一种近乎偏执的苦闷理论认知;而这一苦闷病,恰是20世纪中国的时代缩影与情绪书写。

关键词:苦闷;时代;文学;人生

分类号:I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7)01-0055-04

“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分别在文学、文化、政治层面,对国家和民族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大人物固然可以代言大时代,但小人物也有发声的权利,因为他们虽渺小如草芥尘埃,却更具体地生存生活着,也更直接敏锐地感受着大时代所赋予他们的情感情绪。许钦文就是“五四”大时代里的一个小人物。就作家身份而言,其文学史地位常常被归于乡土文学中而一笔带过。再细说的话,也就是其与鲁迅先生的亲密关系了;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鲁迅先生曾写了一篇“拟许钦文”的小说。1924年2月,鲁迅先生作《幸福的家庭》,副标题赫然便是“拟许钦文”。历史偶然性的背后,往往有其必然性。鲁迅先生唯一的拟作给了许钦文,其实是肯定了他对生活现象的敏锐捕捉,特别是其对时代情绪的准确把握。对这一时代情绪——苦闷——许钦文大书特书:既有创作表达,也有理论著述。苦闷的时代情绪,也是许钦文与鲁迅先生在文学血脉上紧密相联的证明之一。

一、苦闷理论的接受桥梁

对许钦文而言,鲁迅意义重大:是老乡更像亲人,是老师更是人生导师,甚至直接施救而有恩于他;但导师、恩师也并非天然强大。事实上,在许钦文与鲁迅先生过从甚密的那段时间里,恰恰是鲁迅

本人极其痛苦的阶段:《新青年》终刊,“文学革命”团体解散,鲁迅感觉自己是在“沙漠中走来走去”^{[1](P456)};与周作人失和,携老母、妻子仓皇搬家,忙与累更导致他肺病屡次发作;另外,多年的婚姻悲剧更让他坦承,像自己这样的“独身人”,是“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2](P264)}。沉郁、苦痛、彷徨之际,鲁迅选择在精神层面寻求沟通、认同和支撑。日本文论家厨川白村及其《苦闷的象征》,便在此时进入鲁迅的阅读与研究视界。“苦闷的象征”既是此书题目,也是其核心内容。厨川白村认为,文艺的来源与实质是苦闷,而用以表现的手段则为象征。他明言:“(我的)文艺观——即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3](P16)}厨川白村以拿来主义的态度,面对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既有成果,包括尼采的超人论、荣格的无意识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等,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对于这些理论的选取和修正,厨川白村都是立足于人心即精神。独特的人生经历与感受,如“家庭的遭遇,世态的炎凉”,“敏感易怒、忧郁孤独的个人气质”,“离群索居的孤高和冷眼看世界的反抗性格”^{[4](P91)},以及大的社会语境(日本进入现代化进程后的时代病),驱使厨川白村试图寻找出一条用以释放、宣泄

收稿日期:2016-12-10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15SJB790);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JG-ZD14002)

作者简介:刘恋(1979—),女,江苏泰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艺学研究。

以及解答、解决人的苦闷——现代性通病——的路。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苦闷是《苦闷的象征》的必然性质。厨川白村的这一批判接受,有效地拓展了理论视域,从而生发出一种大的人生观与文艺观:文学创作应该来源于对“宇宙人生的大生命”的感受和体悟,文学鉴赏应注重“人和人之间……足以呼起生命的共感的共通内容”^{[3](P35)}。这一人生观与文艺观,超越了阶级、阶层、社会、历史等外在条件的束缚,而直指生命本质。对此,鲁迅甚为激赏,赞曰:“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

基于这种理论认同,鲁迅花费两个月时间(1924年9月至11月)翻译此书,并同时单篇翻译发表了厨川白村的其他论文,还推荐许寿裳、高长虹、向培良、郑振铎、沈雁冰、王鲁彦等文学青年阅读此书,甚至将之作为自己在北京几所高校讲授文艺理论课的讲稿。对此,许钦文记忆深刻,认为这“是很难得的关于文学的理论功课”,给“五四”青年们打开了一扇奇特的文学之窗,让他们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更重要的是,鲁迅先生并不纯粹照搬《苦闷的象征》,而是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随时流露出写做小说的经验谈来”^{[5](P68-69)},所以,听课者——“五四”青年们(也有后来成为作家的)——无不受益匪浅。

鲁迅先生对《苦闷的象征》的翻译、推荐、讲授、再理解和公开传播,影响巨大。在当时及以后一段时间内,许多文学理论著作对厨川白村的苦闷理论,都进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不同层面的呼应、阐述与演绎:如潘梓年直言,要探究文学的根源,应该“从心理活动上的根源找出”^{[6](P41)};孙俚工将“情动于中”创新地解释为“有机体内的刺激”^{[7](P85)};姜亮夫则以“自我表现的冲动”“对他表现的冲动”“求美的冲动”来解释文学的起源,并指出最重要的是“自我表现的冲动”,因为它是“作者生命力的表现”^{[8](P18)};赵景深在复旦大学以及老舍在齐鲁大学讲授文学理论课时所著的讲义,也都引用《苦闷的象征》中的有关叙述。而“五四”青年许钦文,则因其自身的经历以及和鲁迅先生过从甚密,而全身心地拥抱厨川白村及其苦闷理论,并对其加以极其个性化的阐释与演绎。

二、文学理论的根本质地

进入现代化进程中的“五四”时期,有两大公共空间可供中国知识分子用以表达自己对文学的认知:期刊和学府。在期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在学府里讲授相关课程,感性与理性,体悟和经验,提升与概

括,相得益彰。《文学概论》就是许钦文1932年8月至1933年6月间,旅居蜀地时,在成都的几个专门学校里讲授文学概论课所撰写的讲义,193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9]

《文学概论》分引言、总论、分论、余论四个部分。在引言中,许钦文就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错误观点(文学静止观、文学狭隘观和文学机械论)进行了批驳,显示出极具时代感的进化观念、开放心态,以及难能可贵的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其总论等同于文学本体论,阐释文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其分论以文学体裁为序,涉及小说、诗歌、散文等。其余论涵盖了文学批评以及对一些作家作品的具体评析。

苦闷是贯穿许钦文《文学概论》的一根红线。在本体论范畴中,许钦文探讨了“发生文学的原因”。就文学发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许钦文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要有文学?”“为什么会有文学?”而其回答则都是“苦闷”^{[10](P15)}。围绕这一点,许钦文首先肯定了苦闷在文学上的表现方式是象征,然后,设想有人会质疑,如果文学中没有描写悲苦的情形,那么这种文学还是“苦闷的象征”吗?在此,许钦文创设了一个新词——“苦闷的反表”。他甚至表示,即便是纯粹表现“愉快得意的事情”的文学,也是“苦闷的反表的一种”。他将其特命名为“喜欢的追慕”。他认为,在冷酷的现实中,美好的事物本就很少,所以人们只能在文学创作中“追慕”以示眷恋,而这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苦闷。另外,他特意指出,“喜欢的追慕”“只产生在实行革命以前,或者革命了以后”^{[10](P19-20)}。实际上,这是身为“五四”青年和“五四”作家的许钦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怀有的深厚感情,以及对渐行渐远的“五四”时代的无比缅怀。

在创作论范畴中,许钦文用“未然”和“已然”两个概念,分别指涉“表现的文学”和“再现的文学”,以及区分此二者在创作上的异同。在许钦文看来,“表现的文学”的“未然性”体现在“理想人物”的塑造上,其是作者“想象”出来的人物,目的是为读者“示范”生活;“再现的文学”的“已然性”,体现为所描写的发生过的实有的人或事,但依然需要作者“虚构”具体的故事情节。可见,许钦文看重的是作家的主观性与个人性。为此,他创设了一个新词——“探心的险”——来比喻作家的想象与虚构。而所谓“探心的险”依然被他归结到苦闷层面:“什么人格,发生什么苦闷;从什么人格,可以探出什么险来,都是一定的。”^{[10](P22-26)}这又是对个人内心情感及精神层面的

挖掘与肯定。

关于具体的文学表达的技术，许钦文借用“化妆”一词的本意（装饰、修饰），将其加以改造后变为“化妆出现”。其置换成通行的文学理论术语后，应该约等于下意识。许钦文是这样理解所谓下意识在文学中的作用的：人们的理智会经常忽略掉一些东西，这些留在下意识层面的东西，当人们从事文学创作时，会以暗示的方式表现出来；所谓的天才表达，也只是经由了作者长时间的思考与酝酿后，于下意识里呈现出来的。这本属于心理学层面的分析，但许钦文又将所有分析归结到苦闷：苦闷（包括性欲苦闷）往往出现在生命力强大的人身上，他们的这些苦闷（特别是一些隐秘的自私的欲望）无法在现实中实现，也不能为人所知，便用化妆的手段在文学创作中发泄出来。由此看来，许钦文所谓的“化妆出现”，其实是指作家将实际的人生苦闷，用一种伪装修饰的手段表现在文学里，以达到平衡缓释实际心理的作用。所以，他又特别强调“文学是救济神经病的”^{[10]（P30-33）}，即肯定文学有缓解人生苦闷，平衡社会心理的功效。其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鉴赏与批评，也能显示其对苦闷文学理论的执着。其《文学概论》第30讲“作品一斑”对鲁迅先生的《野草》相当拜服，并认为阅后当能深层了解文学是苦闷的符号的意义。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许钦文对苦闷理论的接受和进一步阐释是不遗余力的，不论从哪个方面切入，他都会最终将文学的根本归结到苦闷上。在许钦文看来：文学既源于苦闷，又再现苦闷。

三、苦闷理论的生发基础与表达演绎

人生与文学本就互为表里。许钦文对苦闷文学理论近乎偏执的坚持，实与其人生经历密切相关。《文学概论》面世的前后几年，许钦文正经历着人生的低谷期，麻烦、困厄、灾难接踵而至。为纪念挚友陶元庆，许钦文斥资建元庆纪念室。陶妹思瑾及其同性密友刘梦莹时常来此住，后因情生妒生恨，陶思瑾竟然杀死了刘梦莹，酿成轰动一时的陶刘案。为此，身为房主的许钦文，因“妨害家庭罪”而羁押于浙江杭县法院看守所。获释后，许钦文入蜀旅居一年。1933年8月，许钦文再次锒铛入狱，罪名是更加莫须有的“危害民国罪”（刘梦莹死后被发现持有“共产嫌疑”，许钦文便成了“窝藏共匪”者）。后经鲁迅先生多方营救，一年后，许钦文出狱。此后，他便宅居，专心创作，并着手写《钦文自传》。

《钦文自传》中表露最多的情绪就是苦闷。“愁”“累”“难”“病”“绝”等字样，成为他人生苦闷的最佳注脚。因建元庆纪念室而负债累累，他将居所命名为愁债室，近半生用于偿还债务，此为愁；因陶刘案而被判罪，他感叹实系“无妻之累”，一方面是自己枉担罪名而叫屈，另一方面则惭愧于因自己入狱而给弟妹和家庭带来的无限悲痛与创伤；保释后旅蜀，其所谓难，既指通常意义上的蜀道之难，又有因军阀混战而带来的民不聊生、交通不便的战乱之感；而其病则是指听闻父亲逝世的噩耗后，痛哭不已而生的眼病，以及后来拼命写作《钦文自传》而生的脚病。与众不同的是，对于种种人生苦闷，许钦文表现出宿命般的感受和态度。他认为命运无常，虽然上帝创造出若干“可爱的景物”，但自己触及最多的却是撒旦制造出来的丑恶东西，如蚊子、苍蝇、臭虫等，这令他如坐针毡，痛苦不已。他甚至在偶尔奢望能获上帝拯救时，都会悲哀地预感：“我的撒旦也就来到，马上把我拖回到‘现在’。”^[9]

这种宿命般的苦闷，同样高频率地出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无论是他的带有个人生活印记的回忆式文本，还是参与讨论当时流行的精神性创伤话题的乡土文学，都直接或间接地流露出苦闷情绪。回想往日家人团圆欢聚，他便感慨没有珍惜“最茂盛的”花园以及“最快乐的时候”^{[11]（P44-45）}。因与不合理的旧习俗对抗，他产生了深深的挫败感与悲哀感：即使对“胜利的凯旋”“战死的悲壮”怀有向往与崇拜，却又无奈地承认，自身确实存在一种阻力，从而“使我忧郁，使我泥于前进”^{[11]（P79）}。即便在描写人物客观的悲惨遭际时，他也会借人物的心理活动，表露自己的人生态度，其中充斥的字样都是“悲哀”“悲苦”，并且是“应受”的。^{[11]（P140-141）}

许钦文对苦闷的叙写是多角度的，既有直接的哀感与悲叹，更有别出心裁的戏谑手法。《理想的伴侣》用讽刺手法描写一个青年的爱情幻想和自私的婚姻观。叙述者“我”开篇就发牢骚，以揭示自己所陷入的具体人事的苦闷：因介绍《遗言》这篇文章刊载，而引起读者剑鱼君的不满（指责该文目的不明确与“不顺潮流”）。“我”烦扰之际，想找人打发寂寞，此时，朋友赵元元君来访，并谈起《妇女杂志》征稿一事。“我”便记录下赵元元君心中的理想的伴侣：会跳舞，会唱歌，会弹钢琴。这三个择偶标准乍看似乎很文明，细读文本则知，作者藉此所批判的，恰是当时一些男性庸俗的择偶观：肉欲满足，娱乐追求和金钱至上。而赵元元君为其择偶观所加上的两个附

则,不准干涉经济权(但女方嫁妆得归自己),不要“半新半旧”的女性,则更将这种自相矛盾的爱情婚姻观鞭笞得体无完肤;不仅自私自利,且极其愚昧落后。更耐人寻味的是,赵元元君最初扬言必须找个“新女子”,到后来则推崇“女子无才便是德”,再到后来觉得“索性完全是旧式的”女子更容易对付,直至最后表示“结婚以后不过三年”对方就得死掉。^{[11](P33-35)}所有这一切,看上去都极其荒唐,荒唐的条件设定,荒唐的语言表述,但其荒唐表层下所掩盖的,却是作者深深的苦闷意识:新旧交替的大时代背景下,灰色小人物无所适从,既学不到新的外来思想的菁华,又继承不了旧的传统文化的精神,因此,他们只能随波逐流,甚至徘徊退却。是偶然却也有某种喻指的是:小人物的苦闷,应和着大时代的悲剧。新文化运动从兴起到落潮,恰好也约三年时间。三年,许钦文心中“理想的伴侣”死掉了;三年,许钦文理想的时代也走远了。这恰是“五四”式的苦闷。

许钦文是以跨界身份表达其苦闷情绪的:身为作家,他从事文学创作;作为教育者,他又在学校授课。其实,这两种身份都可归结为一个承受苦闷的人,两种方式都是演绎苦闷的不同渠道。其创作践行着苦闷理论,其授课及讲义,又对苦闷理论进行再次确认。对许钦文而言,厨川白村的苦闷理论是由他的人生导师鲁迅先生译介过来的。这就不仅仅是普通的知识输入,更是一种思想、文学传承上的血脉相联,再加上本人的坎坷经历,因此,他便对这种理论平添了几分坚持与执拗。

窥一斑而知全豹。对许钦文的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反映了“五四”时代的整体氛围:内外交困的国家,深受“精神奴役创伤”的国民,黑暗压抑的社会,来去匆匆的思想启蒙运动,以及一群似懂非懂的青年,在个人的生存困境和时代的生命困惑中,挣扎着苦闷着。许钦文继承鲁迅先生尊重个体生命,追求大格局大气派的文学理论认知,在《文学概论》中,用近乎偏执的语言,书写自己对文学的理论见解。这既是个人的生命表达,也是“五四”时期苦闷病的时代剪影。他以其努力,为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建设,垒起了一块独特而坚实的砖石。

参考文献:

- [1]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2]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3](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M].鲁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 [4]叶渭渠,唐月梅.20世纪日本文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 [5]许钦文.学习鲁迅先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 [6]潘梓年.文学概论[M].上海:北新书局,1931.
- [7]孙俚工.文学概论[M].上海:广益书局,1933.
- [8]姜亮夫.姜亮夫全集(21)[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 [9]许钦文.钦文自传[J].新文学史料,1984(1).
- [10]许钦文.文学概论[M].上海:北新书局,1936.
- [11]中国现代文学馆.许钦文代表作:鼻涕阿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The Depression of “May-Fourth”: Personalized Writing of Xu Qinwen’s Literary Theory

Liu Lia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Law, Yangzhou University Guangling College, Yangzhou 225009)

Abstract: Xu Qinwen is a writer of “May-Fourth”. He expressed a paranoid theory cognition about “Depression” in his teaching material—*Introduction of Literature*. This is because of his own experience and feeling of the life, and because of the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with LuXun. This theory cognition about “depression” is the miniature and mood writing of 20th century.

Key words: depression; time; literature; life